

于罅隙处筑居：评价权过度集中下一种主体生存形态

清醒地识别那把尺子的任意性，却放弃改写它——不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
对个体改写制度底盘之不可能的冷峻判断

刘言言 著 · SDE 学徒工 · 评价制度与生存形态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论争，无论资源匮乏论、文化资本论还是社会资本论，都共享一个未经追问的操作前提——将“评价权”预设为社会结构中一个可以被观察、描述乃至批判的外部事实，而非需要被生成机制追问其生成与维持机制的动态过程。本文不对既有解释进行修补式添补，也不试图在原问题的框架内给出一个“更全面”的答案。本文做的是另一件事：从论争的根部，把问题本身翻过来——不问“寒门为什么难出贵子”，而问：当一群人的一切努力——包括他们的勤奋、他们的自嘲、甚至他们试图突围的动作——都必须经由另一群人所握持的评价语法被转译之后，这种“不得不在他者的语法里生活”的结构性处境，会在主体身上逼生出一种怎样的、此前未被充分命名的生存形态？

本文将这一形态命名为“于罅隙处筑居”。它不指涉一种心理态度或人生哲学，而是一套有严格结构性条件的、可被经验分析的社会性存在形态。其核心是：行动者清醒地识别主流评价标准的任意性，却放弃改写它——不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对“个体改写制度性底盘之不可能”的冷峻判断——转而将生命能量投入社会结构内部永恒存在的罅隙中，在这些罅隙里建造一个不完全依赖主流承认而自持运转的微型生境。这一实践不抵触竞争，却将竞争的结果重新赋值：成败不再由外界那杆秤来定，而由罅隙内部的意义经济来结算。

要理解“筑居”如何被逼生，必须依次回答三个追问——没有第一个答案的基底，第二个追问就无法被真正问出。第一问：逼出筑居的那块土壤——评价权过度集中——本身是什么性质的结构现象？它不是一群人的蓄谋，而是两个社会进程长期矛盾的结算态。第二问：筑居如何从这个矛盾中作为“不得不如此”的生存形态被结算出来？这需要撤销一个被评价权过度集中所悄悄预设的最底层先验——“唯有制度性承认才是真承认”——并展示该先验在现实中被掏空之后，筑居作为一种生成性替代如何被逼生。第三问：筑居在经验世界中的实际形态是什么？其严格的结构条件、日常实践与塌陷边界为何？

本文据此在三个经验现场展开分析：寒门家长对学术统计数据反向挪用、“小镇做题家”自嘲与苦读的共时性双动作、以及大量在日常沉默中坚持着的无名者的漫长实践——第三种姿势恰是筑居最沉默也最深的形态。在与布迪厄、福柯、阿马蒂亚·森的逐层对话中，本文逐条划清“于罅隙处筑居”与习性、自我技术、调适性偏好之间的边界，并正面回应筑居论必须面对的最强反驳——筑居是调适性偏好的别名吗？筑居的大规模发生会否成为评价权过度集中的“安全阀”？本文以诚实的证伪条件收束，坦承这一概念自身的阶层边界与被滥用的可能。全文的论证，只为让那些在铁屋子的接缝处开窗种树的人，不必再借他人的口吻来命名自己正在做的事。

一、问题的重置：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被逼到只能怎么活”

1.1 一把被悄悄竖好的尺子

“寒门难出贵子”这个话题被反复讨论了太久，久到人们几乎不再察觉一个事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被评价标准所塑形的问题。“难”——难在什么地方？考上顶尖大学？在大城市扎根？从事一份拥有高声望的职业？当“难”被说出的时候，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贵子”模样已经被悄悄预设好了：那模样由精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体面职业的工牌和中心城区的住房产权共同拼成。那个“应该达到却没达到”的标尺，早在问题被问出之前就已经竖在那里了。

本文不打算追问这把标尺本身是否合理——关于“成功的定义是否过于单一”“教育评价是否应该多元化”的讨论，已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回答。本文要走另一条路。本文追问的是：当一个人一生的全部努力，都必须被一把由他人握持的标尺所丈量，而他又无法从这把标尺下逃脱时，他会被逼成活成什么样子？

这不是一个关于“反抗”的问题。反抗——无论是公开的抗争还是隐蔽的抵制——仍然是在与标尺对话。你在用反方向的力量去撞击它，你的生命轨迹仍然被它的存在所定义：你每一天在想“如何推翻它”的时候，它仍然是摆在你面前最重要的那件东西。这也不是一个关于“内化”的问题。布迪厄式的符号暴力理论精妙地揭示了被统治者如何将统治者的武断标准误认为客观的、普遍的价值——但如果有人不“误认”呢？如果有人完全看穿了那把尺子的任意性，清醒地知道“这不是我认可的成功定义”，却仍然必须在每个升学节点、每次求职面试、每场社交饭局上接受这把尺子的丈量呢？他把自己的生命活在了哪里？

1.2 在“反抗”与“内化”之外

这个问题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此前未被充分概念化的生存地带。

它不是“认同”——筑居者从未在心理上接受那套标准的合法性。不是“不认同”——不认同只是一种认知判断，不能告诉你一个人怎样活。不是“顺从”——顺从意味着行动被外部赏罚所驱动，而筑居者的核心实践恰恰不依赖外部赏罚。不是“反抗”——筑居者不试图推翻任何东西，甚至不试图改写任何一条评价规则。它是在“评价系统不由你控制”这个结构性给定之下，一个清醒的行动者还能怎样去活——而且这种“活法”不是一种心态、不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想开了”的自我调适，而是一整套需要被严肃分析的社会性存在形态。一套被逼生的、沉默的、日常的生存技艺。

1.3 概念的三层意涵：一个生成性的追问序列

要理解“于罅隙处筑居”这个概念，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可以被逐层解剖的静态物件。这个概念本身必须被置入一个追问的序列中去生成——每一个追问踩实了前一个追问的答案，才可能被真正问出。

第一问：逼出筑居的那块土壤——本文称之为“评价权过度集中”——本身是什么性质的结构现象？它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这是一个生成机制追问，答案在第二章：它不是一群人的蓄谋策划，而是评价标准的科层化与资本化、上升路径的市场化收窄这两个长期社会进程相互矛盾所结算出的、被误当成永恒的临时稳态。

第二问：在这块土壤之上，筑居是怎么被逼生出来的？这是一个机制追问，答案在第三章：评价权过度集中在社会运作中悄悄预设了一个最底层的先验——“唯有制度性承认才是真承认”。这个先验曾经有效，因为曾经有足够多的分散评价共同体各自给出“真承认”。但当评价权过度集中使得制度性承认的通道被单一化到只剩窄门，这个先验便在百万人的日常经验中被掏空了：人们清醒地知道，从那道窄门里签发的“承认”并不比一枚过期的邮票更有实质意义。然而，人仍然需要意义来支撑日常生活——旧的承认体系已经无法供给足够的意义，新的承认就必须从那些“不在制度管辖范围内”的地方被逼生出来。“罅隙”——制度接缝、判断差、注意力游移空间——恰是制度管辖最薄弱的区域，也因而最适合作新承认的生长地。逼生“筑居”的不是压迫本身，而是旧承认的坍塌与新承认的被迫自生这二者之间的张力。

第三问：筑居在经验世界中的实际形态是什么？它的结构条件、日常实践与塌陷边界为何？这是一个经验追问，答案在第四章：筑居不是哲学，不是态度，不是“想开了”，它是一套有严格条件的、可被经验观察的社会性实践。它要求行动者（a）清醒识别主流评价逻辑的武断性，（b）无法从评价系统内撤出资本——你一退学、辞职、退出社会就死了，（c）有能力在社会结构的罅隙中识别并建造一个不完全依赖主流承认而自持运转的微型生境。三条同时成立，才逼出筑居；任何一条断裂，筑居即塌陷。

这三个追问依次递进，缺一不可。没有第一问的土壤分析，筑居就成了凭空发生的哲学发明。没有第二问的机制分析，筑居就成了描述性的标签——你说“他们在罅隙里筑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筑居”而不是别的什么。没有第三问的经验分析，筑居就成了不可证伪的自说自话。以下各章，依次完成这三个追问。

1.4 与既有理论的初次划界：不是修补，是翻地

在展开论证之前，必须做一个清醒的剖白：本文不是在重复已有理论的工作。

首先，本文不是在重复布迪厄的符号暴力。布迪厄的关键词是“误识”——被统治者将任意性的文化标准误认为普遍客观的价值，从而在失败时归咎于自己的无能。本文的关键词是“清醒”——行动者恰恰没有误识。他们完全看得出那套标准是中产阶层习性与制度性加持相互咬合之后的武断偏好。但“看穿”不等于“逃开”。你看穿了高考作文题所预设的文化资本，但你还是得坐进考场写作文。你看穿了职场晋升里那些关于“领导力”“沟通能力”的考核话术本质上是对某种特定阶级气质的编码，但你还是得在年终述职时把自己的业绩翻译成那套话术。这里的核心问题不是“你信了”——你从来不信——而是“你不得不在这套语法里说话”。布迪厄给了我们一套关于信念如何被生产的理论，但没有给我们一套关于清醒如何活的理论。本文接过这个问题。

其次，本文不是在重复福柯的权力/知识。福柯论证了权力关系生产出知识的对象，知识又为权力运作提供科学正当性——这是奠基性的洞见。学术论文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为寒门子弟“测距”，测出的距离数据又反过来证明“你确实需要被帮扶”——权力和知识在此自我喂养。但本文要追问的是：在这些测距报告被生产、被传播的间隙里，那些被测距的人，在怎样使用它们？他们不是静默的数据对象。有寒门家长把“出身劣势导致学业落后的统计规律”剪下来，贴在孩子卧室的墙上——这个动作，把权力/知识机器输出的知识成品拿过来，改变它的意义赋值，将它用作自己小世界里的一件建材，在福柯的理论中没有被充分概念化。它既不是“服从”，也不是“抵抗”。它是本文所要分析的“筑居”的经验原型之一。

本文的野心不在于提出一个“更全面的”解释变量，来加入对“寒门难出贵子”的既有争论。本文要做的事是：从整个争论的根部，把问题的形态本身推倒重来。不问“寒门为什么难出贵子”——因为这个问题里的“贵子”，本身就是一个被评价权过度集中所绑架的概念。本文问的是：在评价权过度集中的结构性给定下，那些清醒地知道这套评价标准武断性的人，被逼生出了一种怎样的、此前未被命名的主体生存形态？

二、土壤：评价权过度集中作为矛盾的结算态

要理解“于罅隙处筑居”是怎么被逼生出来的，就必须先理解逼它出生的那块土壤——评价权过度集中。文献里经常提到“评价标准不公平”“成功定义被精英把持”，但极少有人追问一件更根本的事：评价权过度集中这件事本身，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结构现象？它不是某几个具体的人“坏”，不是某几条具体制度“设计失误”，而是一整套分化路径与交织网络之间长期矛盾的沉淀结果。这节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把这个结算过程说清楚。

2.1 两个进程的历史性分叉

让我们从两个核心进程的分叉讲起。这两个进程，一个管“谁能往上走”，一个管“怎么走才算走到了”。

第一个进程是评价标准的科层化与资本化。它的根扎在科举制——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科层化人才选拔制度之一。科举的要害不在于它考什么内容，而在于它建立起了一个制度性原则：上升通道的合法通行证，必须由一个中央化、标准化的评价系统来签发。这个原则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不但没有消亡，反而被新的制度形式继承并强化了——高考、公务员考试、职称评审、国际期刊论文发表。每一次制度更替都完成同一件事：把评价的权力从分散的地方共同体手里没收，集中到一个科层式的、可被统一管理的评价基础设施中去。

与此同时，这个评价基础设施自身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在市场经济启动之后，又被一个更隐蔽的进程渗透了——资本化。高考所测试的“素质”越来越依赖于家庭购买力的前置投入（课外辅导、学区房、游学经历）；大学录取所看重的“综合素质”越来越内嵌了中产阶层的生活经验（社团活动、志愿经历、海外交流）；职场晋升所考评的“沟通能力”“领导力”“专业形象”越来越趋向于对某种特定阶级生活风格的编码——不是抽象能力，而是在特定物质条件下养成的具身习性。评价标准的科层化给了它合法的盔甲，资本化给了它实质的偏见——两把刀叠在一起，评价权过度集中的结构框架就焊好了。

第二个进程是上升路径的市场化收窄。这个进程比第一个更隐蔽，因为它的推进方式不是“颁布一条限制性法令”，而是“让许多曾经可以走的路，被市场的单一化评价逻辑悄悄封死”。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的“上升”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实现：教育（考大学）、政治表现（入党提干）、技术钻研（八级钳工也是受人尊敬的“师傅”），甚至是在单位里几十年如一日的勤恳积累出一种不被制度化表彰、却被邻里共同体衷心认可的小体面。这些路径彼此并不竞争——一个工厂劳模不会去和一个大学讲师比“谁更成功”，因为他们的不同路径被不同的评价共同体各自承认。

但是，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货币化的评价逻辑——薪酬、资产、消费能力——像潮水一样漫过来，淹没了所有这些分立的小块评价高地。曾经可以走的许多条路，突然被汇流到同一条河里，而这条河的水位被那个最具资本积累能力的阶层所定义。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市场成为社会评价的主导媒介”这个结构转变本身的自然后果：当一切价值都被迫经过货币这个通用翻译器去互译的时候，不产生高货币回报的路径就不是“另一种成功”，而根本就是“失败”。注意这里的机制：不是货币本身坏了，而是货币作为“通用翻译器”把不可通约的价值强行互译了。一个山村教师带给学生的影响，和一笔风险投资带来的回报，本来是无可比较的两种好——但货币翻译器把它们摆在了同一条数轴上。一旦被摆上去，前者就永远小于后者。

2.2 被百万次日常实践所缝制

现在，把这两个进程摆在一起看。一边是科层化与资本化的评价标准越来越统一——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同一套考试的窄门、接受同一套“素质”的度量衡；另一边是能走的路越来越少——曾经可以被不同共同体各自承认的多元上升路径，被市场的单一化评价逻辑碾平为一条独木桥。两个进程叠加的结果是：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够好的定义”被过度集中到了你不生产的那种资本手里，而你恰恰不生产那个定义。

但这里有一个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评价权过度集中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坐在一间密室里蓄谋策划出一套“如何让寒门永世不得翻身”的阴谋。它是一种正在被百万次日常实践所日常缝制的东西——每次一个HR扫一眼简历上的毕业院校就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下看，每次一个家长对自己孩子说“人家能去夏令营你为什么不能去”，每次一个老师在心里默念“农村孩子英语底子就是差”然后不自觉地少给了那个学生一次课堂发言的机会。这些微小到几乎不可见的动作，每一记都轻如鸿毛，但当它们以亿次为单位同时发生——并且，极其关键地，在评价标准已经被资本化定义的背景板上发生——它们就不再是“个人偏见”，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往复循环的加固过程。

这个过程真正顽固的地方在于以下机制：加固的不仅是那些“成功者”对“失败者”的俯视——那可能还容易激起反抗。真正的顽固在于它也加固了那些“被测者”的自我测量。一个寒门学生在走进面试室之前，已经用那套自己不认可的标准给自己打过分数了。“我知道他们看重什么——他们看重的东西我没有，所以他们给我打的分数不会高。”这个走进之前的“预判”，不会让他更愤怒，只会让他更节省——节省在“争取对方承认”这件事上的情感投入。而从系统这一侧看，这种“节省”恰恰是系统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它不需要你真心认可它，它只需要你在行动上不挑战它，不试图推翻它。你省下了情感，它省下了维稳成本——一种沉默的共谋就这样被缝进了日常。

2.3 不是垄断，是过度集中

在此必须做一个术语上的限定。本文选择使用“评价权过度集中”而非“评价权垄断”，是因为“垄断”一词在严格的经济学语义中预设了单一的控制主体——某一个机构或某一个阶级握有定价权——而当代社会的评价权力恰恰不是被单一主体“握持”的。大学、雇主、媒体、社交网络、家庭——它们各自握有不同场域的评价权，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但问题在于：这些在制度上分立的评价主体，在实际运作中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资本化趋同。它们彼此竞争，却共享同一套深层语法——在这套语法里，“好”总是更接近占有更多资本的阶层的习性与偏好。因此，不是某“一个”主体垄断了评价，而是评价标准本身被一种特定的资本逻辑所过度集中。这一区分对于后续论证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筑居者所面对的并非一个有明确地址的敌人可以被“推翻”，而是一张渗透于日常的、没有单一地址的意义网络——你推不倒它，你只能在它的缝隙里自己建。

2.4 土壤里长出的两个后果

这块土壤长出了两个直接后果，它们是将筑居逼生出来的直接条件。

第一个后果：承认供给与承认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在评价权过度集中的条件下，被制度正式签发、被主流承认的“社会承认”变成了一种稀缺物品——它的供给被有限的通道（名校、高声望职业、核心城市的产权）严格控制，而需求却在人口基数和向上流动的渴望中持续膨胀。这个缺口不是周期性的，是结构性的：只要承认的供给仍然被捆绑在少数几个通道上，而承认的需求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法消解的——缺口就会一直存在，且随竞争加剧而扩大。大多数社会成员将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面临承认的供给不足。他们努力工作、遵守规则、达成了许多在地方性标准中堪称出色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在那套唯一被体制化承认的评价语法中找不到对应物。

第二个后果：意义供给的危机。承认的稀缺不是问题的全部。更深的问题是：那些被承认供给排斥在外的人，仍然需要意义来支撑日常生活。你是谁、你做的事有什么价值、你的存在对于某个哪怕很小的世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意义需求不是奢侈品，是人格得以维持的基本营养。当社会的主要承认体系无法为大量的人供给足够的意义时，一个结构性的意义赤字便产生了。这个赤字不能由“想开点”来填补，因为它不是心理问题——它是一整个承认体系的供给失灵。而失灵的体系不会因为你的“想开了”就恢复供给。

这两个后果叠加在一起——承认供给不足，意义又不能不找——便构成了筑居被逼生的最直接的结构张力。旧体系无法给你意义，你又能退到体系之外去活，那么剩下的唯一路径就是：在体系内部那些旧体系管辖不到的细微罅隙中，建造一个不完全依赖那个旧体系的、自给自足的微型意义生境。这就是本文所要命名的“筑居”——不是选择，是在上述封闭条件下唯一还能走下去的活路。

三、撤销与生成：筑居的生成机制核心

前章描述了逼生筑居的那块土壤。一个结构性的追问随之而来：为什么从这块土壤里逼生出的，偏偏是“在罅隙里重新建造意义生境”——而不是心理崩溃，不是犬儒式的冷嘲，不是暴力的反抗？这不是一个可以被前章的土壤描述所自动回答的问题。土壤分析只能告诉我们“有什么条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条件是如何逼迫出一种特定形态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进入生成机制的核心运作：撤销一个被土壤悄悄埋下的最底层先验，然后展示在这个先验被撤销之后，筑居如何作为“不得不如此”的生存形态，从旧承认的坍塌与新承认的被迫自生之间的张力中结算出来。

3.1 被撤销的先验：制度性承认的“唯一真承认”神话

评价权过度集中在社会运作中不只做了一件事——不只是把“谁成功谁失败”的评分权集中到了少数窄门的守门人手里。它做了一件更隐蔽的事：它悄悄地在社会意识中植入了一个先验命题。这个命题很少被直接说出来，但它构成了评价权过度集中下所有人——包括被评价者——的默认认知底盘。

那个先验是：“真正算数的承认，必须是制度性的承认。”或者说，更日常的版本：“你自己觉得自己行不算，得别人——而且是那个说了算的别人——说你行，你才行。”

这个先验在评价权尚未过度集中的时代，曾经是一个合理的工作预设。因为当时存在足够多的、彼此分立的评价共同体：宗族认宗族的好，乡邻认乡邻的好，行会认行会的好，士林认士林的好。一个人在这个共同体得不到承认，可以在另一个共同体得到。而且每一个共同体的承认都是“真的”——它不是别人承认的残次替代品，它本身就是完整的、以它自己的方式流通的社会承认。在这种多元承认并存的结构下，“真承认必须是制度性的”这个命题并不压迫人，因为“制度性”不等于“唯一的”——有很多制度性的承认通道并列存在，互相不吞并。

但评价权过度集中改变了这一切。当上升路径收窄，当评价标准资本化趋同，当“怎么说才算数”的资格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窄门守门人手中时，“制度性承认”悄然从“最权威的承认”变为“唯一有效的承认”。这个转换不是任何人颁布了一道法令促成的——它是百万次日常实践缝制出来的：当越来越多的场合（求职、升学、婚恋、贷款甚至社交）都将你那所毕业院校的名字作为优先筛选信号时，宗族

的好、乡邻的好、行会的好就被无声地废除了——“它们也算承认，但那不算真正的承认，因为它们不能帮你过那道门槛。”真承认与门槛通行证被绑定在一起。你先验地接受了：能帮你过门槛的承认是真承认，不能帮你过门槛的承认是假承认。

这个先验一旦植入，就完成了评价权过度集中中最精微的权力运作：它不需要强迫任何人认可那套评价标准。你大可以看不起它，大可以在私下里说“这不公平”——但你一旦进入任何需要被制度性承认的场合，你就必须接受它的丈量。而且更致命的是：你甚至无法想象，在“制度性承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承认可以真正支撑你活得好。你觉得没有别的承认就等于没有承认——你把自己困在了自己已经看穿了笼子里。

3.2 先验的坍塌：当制度性承认自己否定了自己

但先验不是永恒的。它具有一个内伤：如果被它指认为“唯一真承认”的那个制度性承认，自身已经无法兑现它所承诺的意义，那么这个先验就会在经验中被掏空。而这，恰恰是评价权过度集中的土壤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让我们把上一节的逻辑推进一步。评价权的过度集中意味着：窄门的守门人签发的承认总量极为有限，而需求极大。这造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承认缺口——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拿不到那份“真承认”。这个缺口本身不是最致命的，因为历史上大多数时代都存在类似缺口。致命的是在当代条件下所发生的二次效应：当制度性承认严重供给不足，且这一事实被信息传播技术扩散为公共知识之后，制度性承认自身的象征价值便开始贬值。

贬值机制是这样的：一张稀缺的证书之所以“值钱”，不仅因为它本身能帮你过门槛，更因为它被广泛相信代表了某种真实的优秀——“拿到它的人确实是出色的”。但如果“谁拿到证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个人的出色程度决定，而是由前置的家庭资本投入决定，且这一事实变成了广泛传播的公共知识（“谁不知道要上那个学校得从小砸钱”、“谁不知道那个名额根本就是信息差的胜利”）——那么证书作为优秀证明的象征价值就会坍塌。证书仍然能帮你过门槛（它的制度功能还在），但它不能再提供“我确实被真正地承认了”的那种承认感（它的象征功能死了）。

这就是制度性承认一次缓慢的、日常的自我否定。它自己亲手生产出了否定自己正当性的公共知识：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知道，那套评价标准里的“优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投入而非个人品质的度量。制度性承认还在被签发——还在帮一些人过门槛、还在让另一些人被挡住——但它作为一个意义供给体系的根基，已经被自己生产的公共知识腐蚀了。

当然，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每个人”——不是说所有人都完成了一次哲学层面的觉醒。这个过程不是平均分布的。它更集中地发生在那些与评价系统有最大接触面、承受其压力最直接、同时也最有认知资源去识别其运作逻辑的人群中——他们通常是教育系统的参与者，尤其是那些走过了足够长的教育路径、足以将评价系统的底层逻辑提炼为可被清醒言说的经验知识的行动者。本文所论的“筑居者”，正是从这个群体中被逼生出来。

从生成机制的眼光看，这里正在进行的不是一群人的“觉醒”，而是一个结构层面的条件转变。先验的坍塌不是人为推翻的结果。它是一种结构性的掏空：制度的运作方式自身把制度的合法性根基挖掉了。用本文理论框架的术语说：分化序列（数百万人的教育晋升路径）与交织网络（被广泛传播的关于教育不公平的公共知识）的持续累积，终于越过了一个临界点，使得那个曾经撑住整个评价体系的底层先验——唯有制度性承认才是真承认——在经验中失去了自明性。它不再是“不需要论证就可以被所有人接受”的先验了。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清醒审视、可以被冷峻拒绝的生存选项。

3.3 在旧承认的废墟上：筑居作为一种被迫的自我生成

现在，把前三步串起来：评价权过度集中的土壤（第二章）→ 先验“制度性承认是唯一真承认”的植入（3.1）→ 先验的坍塌：制度性承认自己否定自己的象征价值（3.2）→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最核心的一步——旧承认体系坍了，但意义需求自身没有消失。

这一笔必须写得极其小心，因为它极易滑回“人需要意义所以人创造了筑居”这种模棱两可的心理主义解释。生成机制不关心“心理需求”，它关心的是结构性的逼迫：在旧承认体系的合法性已经经验性失效、而行动者又无法退出评价系统（退学退职等于社会性死亡）的双重约束下，什么形态的生存方式是仅剩的、被这个封闭条件本身逼出来的唯一活路？

让我们精确地框出这个逼迫装置的三条边界条件。

第一条：清醒。行动者必须能够识别主流评价标准的任意性与武断性——不是情绪层面的“这不公平”，而是认知层面的“这套标准在底层逻辑上不度量我的价值，只度量我出生的阶层坐标”。如果缺乏这一条，行动者便处于布迪厄的“误识”之中——他在被武断的标准击败之后仍然归咎于自己不够努力。误识者不会筑居，因为他还相信那套标准的合法性——他只会继续内卷，期望下一次能达标。他的全部生命能量仍然被那套标准捕获着。清醒是筑居的第一个门槛。

第二条：无法退出。行动者不能从评价系统内撤出资本。他不能退学（退学意味着在当代社会结构中彻底丧失议价能力），不能退职（没有经济来源的生存无法维持），甚至不能在公开言论中“卸载”那套评价语法——他面试时还是要用那套话术包装自己，他在同事面

前还是要把自己的业绩翻译成“领导力”和“沟通能力”。一旦你还在系统内吃饭，你就必须按系统的语法说话。这不取决于你的清醒程度——这是一个生存层面的、不带任何心里挣扎的交易。你不撤出评价系统，因为撤出等于社会性死亡。但你不相信它——因为你无法相信一个自己已经看穿的东西。这里的关键词是“分裂”：筑居者的外部行为仍然在跑评价系统的脚本，但内部的意义结算已经不再经过那台旧结算器。他在旧系统里继续做“该做的事”，却已经不再期望从旧系统里获得“真承认”。不是不在乎，是不会把整个自我压缩成等待被旧系统丈量的那块材料。

第三条：罅隙的存在。社会结构的评价体系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尽管评价权高度集中，制度仍然有其永远无法治理到的接缝处。这些接缝存在于不同场域之间（学校评成绩，但线上社区评才华）；存在于同一场域的不同评价者之间（两个面试官对一个候选人的判断并不完全一致）；存在于同一个评价者在不同时间的注意力游移之间（老师今天累了，没碰上批评某个学生）。每一个缝隙都细小、短暂、随时可能被回填，但在它们存在的时候，它们就是暂时不受主流评价管辖的微型飞地。旧的承认体系在这些飞地里没有管辖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有管辖权但懒得管。如果旧体系还能在这些飞地里管到——比如所有的线上社区也都被卷入了那套资本化的评价语法，所有的非正式互动也都被纳入了量化考核——那么罅隙便不存在，筑居便不可能。

三条条件必须同时成立，缺一不可。缺清醒，簍；缺无法退出，人不会走向筑居——因为可以退却的人不需要在罅隙里筑居，他可以直接离开战场。缺罅隙，清醒且无法退出的人会怎样？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边界问题，本文将在第四章的“筑居塌陷”一节中作为理论边界给出答案——崩溃、或犬儒。筑居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三条条件同时碰齐时发生的、被多种压力共同塑造的、可以被经验地识别的那一种可能性。

3.4 筑居不是“偏好调适”：与阿马蒂亚·森的正面对话

在筑居的生成机制核心最终厘清之前，必须先击退一个最强的对手。在全文所有可能替换“筑居”的已有概念中，最接近也最危险的是阿马蒂亚·森的“调适性偏好”。

森的论证大意是：被持续剥夺的人会产生适应性偏好——他们降低自己的欲望、调整自己对“好生活”的定义，以使自己能够在恶劣条件下报告“我挺幸福”。这种自我报告不能证明他们真的活得好，而只能证明他们已经将“活下来就是好”内化成了幸福的标准。森的论证在伦理学与福利经济学中具有奠基性地位，因为它解决了功利主义框架中将主观满意等同于客观福利的盲区：你不能通过让人变得更易满足来提高福利，因为那个“更易满足”本身恰恰是剥夺的标志。

筑居论与这一论证之间存在一个不得不澄清的张力：如果筑居者看起来也“降低了对主流成功的渴望”，那么他是否只是一个用美学辞藻包装过的调适性偏好主体？

森本人的论述可以为这场区分提供起点。他在多处文本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主体性姿势：一种是福利层面的“功能选择”——在给定的可行能力集内选择实现哪些功能（being well）；另一种是能动性层面的“行动者”——不仅追求自身福利，也在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与承诺，且这个追求过程本身对行动者而言构成了内在的价值。森的框架容纳了这一区分：一个人可以一方面在福利层面接受“我买不起豪宅”（功能集的客观限制），而另一方面在能动性层面仍然积极地、清醒地、顽强地追求某种自己设定的意义目标——并且他追求这个目标时的精神状态，与一个被剥夺到降低了全部欲望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筑居者恰恰落在这个“能动性”的区域里。他不是“我不需要被承认”，而是“我在罅隙里找到了另一个生境，在其中建造了一套可以替代旧承认的、自身内部自洽的承认经济”。他不是降低了欲望——他在旧欲望崩塌的位置上生出了新欲望。这新欲望不长在旧评价体系的标尺上：他不要求旧体系签发“你成功了”的证书，但他在罅隙内部对成就的要求毫不放松。筑居者不是“容易满足”，他是“换了一样东西来满足”——而这样新东西，是他在清醒认知旧体系之武断性后，自己参与建造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判别“筑居”与“调适性偏好”的三条经验边界，每一条对应一个可观测的、有分化反应的行为指标。

第一，偏好重塑的指向维度。调适性偏好的主体在原来的福利维度上“往后退”——他说“我不需要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声望”。筑居者不在原维度上往后退（他可以去接受更差的工作条件，但他的内在目标并未调低），他是在一个新的、被他自己定义的意义维度上“往前要”——一个小生境内部的完善、一套只有他自己和少数同道人承认的实践标准。因此，经验上可观测的分化第一点：当被问及“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在原来的评价体系里大幅跃升，你会接受吗？”时，调适性偏好者倾向于说“无所谓/不需要/那些没用”（因为这整层欲望已经被压抑了），筑居者则倾向于给出分化的回答：“如果跃迁不要求我放弃罅隙里的生境，我会接受，为什么不？但如果跃迁意味着我必须把罅隙填平，那就不值。”筑居者没有被压抑欲望——他只是重新分配了欲望的权重。

第二，意义供给的来源。调适性偏好的主体在心理层面“说服自己”现有的就是够好的；其信念变更在因果上是心理的一种防御性运作。筑居者不是说服自己“旧体系挺好的”——他清醒地判定“旧体系是武断的，我一己之力改不了它”——然后动手去做另一件不同的事。他的生存满足不是来自心理运作，而是来自他确实在做一件事：他在罅隙里建起了一个可以产生内在回报的活动系统。这里的经验判准是：筑居者有可见的“实践产物”——一个自学社群、一个地下兴趣组、一套手工技艺、一套被他认真维持的微型日常秩序——这些产物的维持本身独立于主流承认，且他确实在维持它们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调适性偏好者没有这一层实践结构。

第三，情绪状态的底层语法。调适性偏好常伴随一种“放弃后的平静”——那是一种疲惫的、缺乏向前张力的安宁。筑居者的状态不是“安宁”，而是“专注”——他在自己砌的那块罅隙空间里，仍然有焦虑、有不满、有“我要把这件事做好”的紧张感。他的焦虑没有消失——它只是转移了场地。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筑居的人仍然在积极地、紧张地活着。他不是被拔掉了张力的人，他只是把张力从旧体系的跷跷板上卸下来，安到了另一台由自己参与建造的机器里。

需要申明的是：以上三条不是逻辑推演的结论——它们是这个概念的生成机制属性所要求的经验边界。筑居如果不能在经验上被与“只是降低了欲望”区分开，它的独立性就站不住。森的工作之所以是筑居论必须首先通过的关卡，正是因为森在一个非常接近的地方画了另一条线：在森看来，被剥夺者报告满意，恰恰是最不应该被信任的证据。筑居论不挑战森的这条核心洞见。筑居论做的是另一件事：它辨认了一种在森的理论光谱中被关在“能动性”区域内的特定形态——这个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退出了对旧承认的追求，但他不是被剥夺到退的，他是看穿之后转的。这个“转”，不是调适性偏好的心理防御，而是一个有意识的结构性实践。他退出了旧游戏，但他在罅隙里自己画了一局——这一局不是旧游戏的缩水版，而是另一个游戏。

四、筑居的经验形态：三个现场的素描

前三章完成了筑居的生成机制推演：在评价权过度集中的土壤里，制度性承认的先验从自明走向坍塌，筑居作为一种在封闭条件下被逼生的、清醒的、在罅隙中建造意义生境的生存形态被结算出来，并通过对阿马蒂亚·森的正面对话划清了自己的概念边界。本章将这一抽象机制植入三个经验现场，以展示筑居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形态——不是作为“例证”来支撑已经完备的理论，而是作为理论必须去触碰的具体血肉：一旦筑居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它就必须有能力在被观察的经验世界中落锚。

本文所倚重的经验素材，主体来自两个来源：（1）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对寒门子弟教育经验与家庭策略的质性研究文献中累积的案例片段——这些文献通常在田野访谈中记录了行动者的话语与实践，本文对其中的关键片段进行二次概念分析；（2）公开网络空间中由行动者自发书写的经验叙事——包括社交媒体上的自述、相关专题报道中的深度访谈、以及公共讨论中被反复引用的“小镇做题家”话语档案等。这些素材并非由作者以系统田野方法收集，因此本文的经验分析定位为理论推动的概念性分析，而非独立的经验研究。它的目标不是证实筑居的普遍存在，而是展示：筑居这个概念一旦被提出，它确实能够让我们在已有的经验素材中，看到此前未被命名的某种共同形态。

4.1 寒门家长的反向挪用：让统计数字在自家墙上长出另一种意义

第一个现场是本文在引言中已提及的寒门家长案例。这一案例的最初记录来自一组对工薪阶层家庭教育策略的访谈研究。受访者中的一位母亲，在得知某项教育追踪调查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学业成就有显著预测效应”后，将这篇研究报告的摘要剪下来，贴在儿子卧室的墙上，在剪报的空白处手写了一行字：“你看，你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已经是逆流而上。”

这个动作——把一柄原本用于描述“你有多大概率失败”的统计武器，拆下它的刀刃，反手安上一个由自己赋予的意义手柄——抓住了筑居实践最精微的技艺：不是拒绝知识，而是改变知识的赋值。统计报告本身没有变——那些回归系数没有被她涂改，那些概率数据仍然冰冷地印在纸上。但这个母亲在统计报告与她儿子的日常实践之间植入了一层旧评价体系无法收编的意义中介：在旧体系的语法里，这个数据是用来警示“你可能不够好”。在她的语法里，同一个数据被用来证实“你已经比大多数人走得远了”。同一个知识，进入不同的意义生境，产生截然相反的因果效力。

这不是“自我安慰”。这位母亲没有说“只要快乐就好，成绩不重要”——恰恰相反，她在督促孩子继续努力。她没有退出评价系统的竞争。但她更改了竞争的记分牌：成功不再等于“考上顶尖大学”，而是“在每一段路程上都克服了你这个起点的孩子通常克服不了的阻力”。这个重新计分的动作发生在家庭四墙之内——一个主流评价体系管不到的罅隙。学校只看你的分数与排名，不管你克服了多大的阻力才得到这个分数。这位母亲在自己手中填满了学校这不可见的盲区，造就了罅隙内部的承认供给：它不取代学校的承认——孩子仍然需要考上大学——但它给学校尚未签发的承认空档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此刻就可以领到的承认。

将这个动作命名为“反向挪用”，需要做一个更精确的生成机制厘清：不是所有的“挪用”都是筑居。被挪用的对象——这里的统计学知识——本身就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知识的产物：它用科学话语把寒门的劣势客观化、可测量化，从而为“你需要政策干预”铺平了认知道路。但这个母亲在挪用它时，它行使的已经不是权力了。它在行使一种在权力/知识的循环之外的意义生产：不是抵抗——抵抗仍然在同一个战场地里争输赢。是绕开战地——我自己在自家墙上另起一块记分板。此即筑居在社会结构内的实操刀法门。

4.2 “小镇做题家”的自嘲与苦读：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的共时性实践

第二个现场来自近年来被广泛讨论的“小镇做题家”话语现象。

“小镇做题家”这个自我指称，本身即是对制度性承认的双重动作的完美体现。一方面，它是一记清醒到近乎冷酷的自我诊断：“我能考成这样，不过是靠刷题练出来的一种可以被标准化考试所识别、却无法被任何日常生活技能所证成的狭隘能力。出了考场，我什么都

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行动者已经完全看穿了所谓“优秀”的武断出身：考试奖励的不是真实的能力，而是被特定训练模式所形塑的应试技能——而这种训练模式本身就是城市中产教育投入的工业化产物。在这个意义上的“自嘲”，是在执行布迪厄式的祛魅：我已经知道你这套尺子不量我了。

但另一方面——同一群自嘲为“做题家”的年轻人，在同一时期，仍然在天不亮就起床刷题。他们仍然在拼命往里挤。他们并不是嘴上嘲讽考试、行动上退出考试。他们是在清醒认知这把尺子武断性的同时，仍然把脚踩在这把尺子上。这种共时性的双重动作——“我鄙视你，同时我拼命够你”——在传统的反抗/顺从、抵制/服从的二元坐标里找不到位置。

筑居论为此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内心分裂”的解读。“看穿”与“仍在做”不是一种认知失调的症状，而是一种在结构逼迫下被精确校准的策略性分层：外部行动仍然跑评价系统的脚本（因为不跑就会被系统甩出去），但内部的意义结算并不经过那台旧结算器。那个在凌晨刷题的“做题家”，他不是在为“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人”而刷——他知道考分不能证明这个，他早就不指望那套评价体系给他签发真正的承认了。他刷题是在为争取“能够继续留在系统内”的基本资格而刷——可以下一轮继续跑，可以不被淘汰。真正的意义供给来自别处：来自他在罅隙里建造的那个微型生境——可能是他在某个冷门领域里的深度阅读与自得，可能是他在一个线上小社区里被同道认可的专长，可能是他在写作、手工、音乐中构建的一个不被考试量化的自我评价坐标。刷题是生存，罅隙是生活。这两件事不是矛盾的——它们是那同一个清醒主体的两副脸孔。在前台的舞台上，他跑着别人写的剧本；在后台他自己找来的空箱子里，他为自己建了一座小剧场。

这里的罅隙，具体落在什么地方？它在时间的缝隙里——午休读闲书的那四十分钟，晚上睡前在社群里聊天的那半个小时；在注意力的缝隙里——课堂后排在笔记本空白处画的涂鸦、晚自习间隙在手机上写的那一百字随笔；在制度权威的盲区里——班主任不关心也不懂得如何去评价你的那个兴趣领域，教导主任的量化考核覆盖不到你发在某个小平台上的几十个粉丝的认可。

有人在读到这里时会问：这不就是所有人都多少会做的一天摸鱼吗？不。区别在于：摸鱼对行动者而言是消极的逃避与消耗——它是从正事中偷出来的放纵。而筑居的罅隙实践对于筑居者是一件正事：它被认真地规划、维持、投入情感与认知资源，它产出的不是疲倦后的放松，而是让第二天继续跑脚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意义给养。没有这个罅隙，做题家就只剩做题——而纯粹的做题，是养不活一个人格的。

4.3 沉默的无名者：当筑居不留下任何可以被记录的痕迹

前两个现场——寒门家长的反向挪用、“小镇做题家”的共时性双动作——都属于“有清晰语言表达”的筑居实践。行动者能够用话语说出自己的处境与策略：那位母亲会接受访谈，做题家们在网上写了大量自我分析。这让我们可能最远地走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前：那些不说话的人呢？

那些不会接受访谈、不在社交媒体上书写自述、不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提炼为可以用“话语”被学者记录下来的叙事的人——数量上他们远远多于上述两类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在筑居吗？还是他们只是简单的“被压垮了”或“麻木了”？

这里，筑居论面临它离弃了整个话语传统的最深的一块经验盲区。本文无法用证据填补这块盲区——因为这些人没有留下可被分析的话语痕迹。但本文必须在这块盲区的边界上，诚实地完成最后一笔理论素描：以一个由田野笔记片段拼合而成的、最接近“无名筑居”的形态为参照，勾勒一个可能在大量静默人口中正在发生的日常实践轮廓。

这个轮廓是这样的：一个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了十几年的工人，从不在同事面前讲什么“自我实现”。他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从不惹事，没有在任何公司的意见箱里投过改进方案。但在他的家中，有一整套被他自己经年累月搭起来的微缩模型城市——材料来自网购的边角料、过期的杂志、孩子用剩的硬纸板。这套模型城市不是“作品”——他没有想过要参赛或展览。他每个周末花数小时在这个模型上，不说话，一个人。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这个，但从不去看，因为她觉得“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又不能当饭吃”。他被问到为什么做的时候，说“也没什么，就是想做好，做完了这边这块再想那边怎么拼。”

在这里，筑居完成了它最沉默的形态。“想做好”——这不是回应任何一个外界评价者的评价需求。他的“好”是一个只有他自己和面前那堆材料之间存在的内在标准。这个标准从不出声，从不申请外部承认。但它的确在起作用：在周末下午的那几个小时里，他活在不依赖公司绩效考核也不依赖社会声望排名的方式中。

这一类实践是否构成“筑居”？它符合本文给出的三条结构条件：（a）清醒——他从未在话语中表述过，但他用行动拒绝了把人生全部押在主流评价上的活法。（b）无法退出——他仍然每天上班养家。（c）罅隙——周末下午那几个小时，不属于公司管，不属于社会期望管。在那个罅隙里，他建造了一个微小但真实的、自持运转的意义生境。这个生境没有记录，没有话语，没有任何学者可以把它译成可以被引用的“叙事”——但它就在那里。它是筑居最沉默也最深的形态。

4.4 筑居的塌陷：当三条腿断了一条

一个诚实的概念必须在它自己的边界上接受反击。本节倒推一步，追问：在什么条件下，具备前文所述三条条件的行动者不选择筑居——或者更精确地说，筑居失败、塌陷、无法生成？

第一种塌陷形态：罅隙被制度回填。这在管理精细化时代越来越常见。当工作流程被全面数字化监控，当休息时间被职场群消息渗透填塞，当学生的在校时间被延时服务全覆盖——罅隙不再是“被漏掉的空间”，而是被特意填平的空间。不是制度接缝不存在——是制度主动在填。一旦罅隙被填到连一个周末下午都被工作群消息占领，筑居便失去了最基本的空间条件。没有罅隙，筑居不可能——这不是理论旨趣的问题，这是物理空间被管理的问题。

第二种塌陷形态：清醒被耗竭。清醒识别主流评价逻辑的武断性需要认知资源与情感能量。它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看穿之后就能用一辈子。它在日常生活的循环中需要维系——每当面试、年终考核、晋升评定反复向你证明“你那套不管用，回来用我这套”的时候，清醒都需要被重新确认一次。而当一个人在连续多次的挫折与疲惫中放弃继续“看穿”时，他可能滑回误识——开始相信“也许确实是我自己不够好”——也可能滑向犬儒——不是冷峻地看穿，而是对所有意义的不信任，包括对自己罅隙内生境的意义也不再信任。犬儒的公式是：既然A是假的，B也是假的，那么什么都是假的。筑居者的公式是：既然A是假的，我不再为其投入，但我在仍然真实的B上投入。二者的分界线，就在于清醒是否还在运作——那套在罅隙内对自己建造的生境仍然抱有的、不是对外宣传而是真实在做的投入。

第三种塌陷形态：被安全阀化。这是下一章必须专节回应的最强反驳——在此只标出它作为筑居的一种塌陷方式：当筑居实践不是由行动者自己从内部建造，而是被系统管理者识别、收编和推广——比如企业HR在减压培训中兜售“工作之外找点小确幸”——筑居就从逃避旧评价的行动蜕变为旧评价系统自我维稳的润滑剂。更具体的分析留交下章，但此处必须点明这一塌陷路径的存在，以正概念的结构完整性。

五、划界与反驳：筑居与其他生存形态的逐层对话

在理论的四壁尚未砌成之前，必须先画清它不从属于哪一家的地界。前文已与布迪厄（1.4）、福柯（1.4）、阿马蒂亚·森（3.4）完成了初步的逐层划界。本节将剩余边界的逐条厘清，并按理论的严格性顺序回应筑居论必须面对的两大反驳——“它是调适性偏好的美学别名”及“它是评价权过度集中的安全阀”。

5.1 筑居与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笔下的“弱者的武器”是：不正面挑战权力，但通过怠工、偷窃、谣言、阳奉阴违等方式持续消耗权力的资源，在暗处和强者打一场不对称的持久战。筑居与此有两个根本不同。

第一，“武器”针对权力——怠工、偷窃都是在削弱权力运作的效率。筑居不针对任何东西。筑居实践的核心指向不是“给你拆台”，而是“我自己建一个台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的台子还在那里，我的台子不碍你，你也别来碍我。第二，“武器”终究是消耗性的，它本身不产生正面的、独立的意义供给。怠工之所以有意义，只因为你在对抗一个压迫者——一旦压迫消失，怠工就失去了意义坐标。筑居是生产性的：它自己就是自身的意义。它不是为了报复谁，它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个活法，而你的活法装不下我”。

5.2 筑居与德塞都的“战术”

米歇尔·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的“战术”与“战略”区分，是筑居论在辨析自身边界时遇到的最微妙的对话者之一。德塞都的核心洞见是：战略属于强者，拥有自己的空间（一个机构、一座城市、一套制度）；战术属于弱者，没有自己的空间，只能在强者划定的空间内部进行时间性的、暂时性的、狡黠的操作。“战术”的关键词是“偷袭”——在对手看不见的时刻利用对手的资源为自己谋取短暂利益。比如，一个工厂工人用公司的机床在午休时做一件私人物件——他占用了公司的空间（场地）和时间，但在不被注意的缝隙里把那个空间暂时转化成了另一用途。

与筑居的距离在三笔上显出嶙峋之岩。

第一笔：空间的性质。德塞都的战术没有自己的空间——它寄生于强者的空间之上，一被发现即被驱逐。筑居的罅隙是“被漏掉的空间”——不属于强者，也不曾属于强者——它没有被划定用途。它不是寄生于强者空间里的盗用者，而是在两块地盘的接缝处自己开垦了一小片无主之地。第二笔：时间的结构。战术是事件性的——“一次偷袭”。筑居是持续性的——“把这里变成日常”。第三笔：与权力的关系。战术仍然以强者的存在为条件——没有战略就没有战术，战术是战略的影子。筑居虽然也依赖罅隙的存在（罅隙的边界由评价体系覆盖范围划定），但筑居内部的运行逻辑是自主的。它不自视为任何人的“影子”——它就是自己那堵矮墙。

这两小节划界，合为一句：筑居不是弱者在强者面前隐匿自己、消耗对方或偷用对方资源的操作手册。它是一种在旧体系之外为自己另辟空间并把这空间认真当日子过的实践。它不是抵抗的微雕版，而是生存的独立版。

5.3 筑居与“美好生活”／中国传统中的退隐

有一种直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退隐——陶渊明归园田居，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难道不也是一种“于罅隙处筑居”吗？

必须明确回答：不是，而且这种不是必须被清楚地说出来，因为二者的混淆会彻底冲淡筑居概念的结构硬核。退隐者的选择是“主动离开”——他有选择。他可以选择留在朝廷（尽管憋屈），也可以选择挂印归乡——他有挂印的经济资本（他的田产不会让他饿死），有归乡后的社会资本（乡绅的身份让他在地方上仍然受人尊重），最根本的，有“可以离开”的制度空间。寒门筑居者没有“可以离开”的选择。他挂不了印——因为他没有印可挂；他回不了乡——因为他的乡已经是空心的，没有等待他的田产和地方性承认。他是被推到了没处可走的那一步，才在罅隙里停下来的。退隐者在主动缩小自己的世界——从朝堂减到田园。筑居者是在原有世界内部建造出一个小世界——他不能从原有世界里退出去，他只能在一块本来不是用来住人的边角地，自己搭了个棚子。这不是精神上的归隐，而是结构上的被迫。

5.4 反驳一：筑居者的“清醒”，是真的清醒，还是另一种自欺？

这一反驳来自福柯—布迪厄范式的连贯性：如果你声称筑居者“清醒地看穿了评价逻辑的武断性”——你如何经验地确定这个“清醒”不是一种更精微的自欺？一个人嘴上说“我知道这标准不公平，但我在罅隙里找到了真意义”——布迪厄主义者会反问：你怎么排除他不是在用这套“清醒”话语合理化自己的失败？他不是“清醒”之后主动选择了罅隙——他是在主流通道上走不过去之后，被迫停下来，然后用“罅隙”的话术给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说法。“筑居”不过是一张比“我只是个普通人”更雅的遮羞布。

这个反驳是筑居论在经验层面必须逾越的最深的一条沟——比调适性偏好的理论威胁更棘手，因为它指向的不是概念的重叠，而是概念的真值条件：你用什么判据来断定一个人是筑居者而不是自我美化的失败者？

回应分三层。

第一层：承认反驳的力量，收缩声明的边界。筑居论不声称可以穿透人的内心来判定谁真清醒谁假清醒。任何第三人称的外部观察都无法百分之百地区分“真筑居”与“自欺性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反驳是成立的。但这不是筑居论独有的难题。布迪厄的“误识”同样无法用外部观察百分之百地区分——布迪厄如何知道那个他说“被符号暴力统治”的人是真正误识了、还是在清醒地假装误识以谋取利益？任何涉及主体内部认知状态的社会理论，都须在“外部判据”与“内心状态”之间保留一道未闭合的间隙。筑居论坦诚这道间隙，不声称可以百分之百地弥合它，这与布迪厄理论所处于的是同一种认识论处境。

第二层：给出经验上可观测的、可错的判据。尽管内心状态本身不可百分之百触及，但筑居者的行为模式与自欺者的行为模式之间确实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自欺者的核心行为特征，是在罅隙实践中缺乏持续的投入与产出——他的“筑居”只停留在话语层面：“我不在乎那些了，我有自己的活法。”但他的日常时间仍然大量消耗在被他说“不在乎”的主流竞争中，他没有一个可见的、被他认真维持的罅隙实践结构。真正的筑居者则在罅隙中有可见的、持续的、需要付出成本的实践投入——他在那上面花了大量时间，他做出了可以被罅隙内部的同行人评估好坏的产出，他在这项实践中承受着挫折、进行着修正、维持着一种不为外界所知的自律。这些行为模式在经验上是可观测的：研究者可以在田野中通过追踪时间分配、询问罅隙实践的具体细节、观察该实践是否有内在的评估标准而非仅有话语宣称等方式，进行可错的判别。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判别，但它是社会学可以操作的判别——不比布迪厄通过文化消费偏好来判别“习性”更模糊。

第三层：翻转追问——自欺的风险，恰恰佐证了筑居概念的必要。为什么一个人会被逼到需要编造一套“我在罅隙里找到了意义”的话术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因为他活在这样一个结构里：旧评价体系给了他承认的承诺，却不给他承认的供给；他被困在其中，不能退也不能赢。在这种结构处境下，“编造一套自我合理化话术”本身，就是结构压力的症状。自欺者的存在——如果他是自欺者的话——不取消筑居论的必要性：它恰是筑居作为一种生存形态在被逼生出来之前、最接近“筑居”却又还没跨过那道门槛的过渡态。自欺者是一个还在挣扎着寻找词语来描述自身处境的准筑居者。他词汇还不成熟，他的实践还没跟上，但他被同样的结构土壤推动着。筑居论不拒绝他的存在——筑居论为他的进一步演变预留了一条可以被分析的经验路径。

5.5 反驳二：筑居的大规模发生，会否成为评价权过度集中的安全阀？

这是筑居论无法回避的政治合法性拷问。论证筑居是“解放”而非“更精微的自我压抑”所面临的终极障碍在于：如果筑居让一个人满意度提升、内耗消失、在罅隙里活出了微型生境内的“美好生活”——那么他很可能就会更少抗议，更少要求系统改革。历史上每一次权力结构的巩固，都曾受益于一种能够消解反抗的文化形式——宗教的来世承诺、大众娱乐的麻醉功能、“小确幸”的消费主义伦理——它们无一例外在被压迫者身上完成了同一件事：让你在不变压迫结构的前提下，觉得日子还能过。筑居凭什么不是这一谱系中的最新一员？

回应必须极其精审，因为它必须同时守住两件事：既不能滑入“筑居是没错的，错的是系统”的辩护主义，也不能接受安全阀指控的

全部逻辑从而否定了筑居对行动者的真实庇护价值。前者失之浅，后者失之冷。

第一笔：安全阀功能的必要条件——定义权归属。 一个实践体系要成为系统的安全阀，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它的意义内容由系统或其代理人所生产，或至少在其定义权的管辖范围内。宗教的来世承诺由教会阐释，小确幸的消费伦理由商家和生产它的文化工业供给。这些安全阀的运作机制是：系统让你在它允许的范围内获得满足，以换得你在它不希望你造反的领域保持安静。它们提供的是系统授权的替代满足——系统想给你的，它给；系统不想让你拿的，它仍在继续从中获利，你不争了。

筑居的本质与此截然相反。筑居的意义内容不是系统生产的，不是在系统授权的罅隙内由系统分配的精神福利。它是由行动者自己在不被系统管辖的罅隙里重新种出来的。它不是系统给的，它是自己长的。二者的区分是根本性的：系统的安全阀是一条减压管——气体还是系统的气体，只是另开了一条道让它跑掉，免得炸罐。筑居不是减压管。筑居是行动者在罐壁上找到一处细小的、未被焊死的缝，然后自己在那道缝上栽了一棵草。草的光合作用不消耗罐里的气体——它自己吸收光，自己产生氧气。罐子还在，罐子里的气体仍然让人窒息——但在这棵草旁边，空气突然短促地、脆弱地干净了一小片。这一小片草不是系统的恩赐，它是你偷来的、自己种的、系统没顾上把它拔掉的一小片飞地。

第二笔：清醒的持续运作使得筑居抗拒被安全阀化。 系统的安全阀不需要你是清醒的——事实上，最好的安全阀恰恰是让你以为自己很清醒，让你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对抗系统的方法，从而不需要再在真实的层面挑战系统。宗教给受难者一个“真正的正义在来世”的叙事，让受难者以为他拥有了被许诺的最终胜利——他不是清醒的，他活在一个更宏大的幻觉里。筑居者不活在幻觉里。他没有一个“终究会翻盘”的宏大叙事。他知道评价权过度集中不会被他的罅隙改造，他知道自己筑居只是在暂时为他个人（及他身边一小圈人）提供局部的庇护，他不会以为这座罅隙总有一天会扩展成新的主流。这份清醒不能让筑居避免被安全阀化利用的可能——的确，一个清醒的筑居者和一个被欺骗的小确幸消费者，对系统而言在功能上可能是等效的：他们都安静了。但清醒赋予筑居者一种在临界点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可能——罅隙可以被连起来，微型生境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形成跨罅隙的网络，而自欺者没有这种潜在能力。安全阀理论的一个盲区是：它只看到了系统对原子的收编，没有看到原子之间的罅隙可以被筑居者自己缝成网络。当某一个具体的筑居者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这道缝上种了草，旁边的人都种了”——种草的孤僻动作就可能在不自觉间长成一片共享的生态。

第三笔：承认安全阀功能在现有条件下的真实危险，并以诚实的条件句收束。 筑居论不声称筑居天然地、自动地免于被安全阀化。在一个罅隙持续被回填、原子化持续加剧、筑居者之间无法形成任何水平联系的社会中，筑居确实在客观上行使着安全阀的功能：它让那些最可能产生反抗意识的人安静的活在了自己的小生境里，不再成为系统的威胁。这一效应是真实的，筑居论不能也不应该否认它。筑居论的回应不是否认危险，而是明确给出系统攫取与个人自主的分界条件：筑居不被安全阀逻辑消化的严格条件，是筑居者保有对自身罅隙生境的意义解释权，且存在罅隙之间水平连接的可能。 当这两个条件成立——意义不由系统分配，是行动者自己赋予；罅隙不被原子化隔离，偶有相通——筑居便不是安全阀，而是那些“不打算推翻系统，但也不再被系统完全定义”的人，在一块无人之地自己建起来的小砖房。当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被系统策略性地通过回填罅隙隔绝连接破坏时，筑居便在现实意义上陷入了安全阀化——这是筑居论必须诚实面对的政治塌陷形态，已经在4.4节的第三类塌陷中预先申明了。

第四笔：为筑居者保留选择退出筑居、返回集体行动的政治可能。 安全阀理论最让人窒息的不适感来自：它似乎在暗示，所有让你在压迫下获得一点喘息的方式，都是权力的同谋。这道逻辑如果推到尽头，会得出一个极寒的推论：你必须保持痛苦，才能保持反抗的资格。筑居论拒绝这个推论。筑居论认为：在无法改变结构的当下，清醒地为自己建造一个有意义的微型生境，不但不是同谋，而且是在为自己预留一个能够在未来参与集体行动时不被彻底压垮的人格底盘。一个人如果连一口自己种的氧气都没有，他只会被困得失知觉——而一个失去知觉的人是不会参加任何行动的。筑居不妨碍行动——它在为可能到来的行动蓄力。当行动来临时，筑居者不是零起点者。

六、边界与证伪：当一个概念准备好被驳倒

一个诚实的概念，必须接受自己可能的死法。以下逐一列出。

第一，经验驳倒。 如果系统性的经验研究表明：大量满足第一章所述三条边界条件（清醒识别评价标准的武断性、无法退出评价体系、社会结构存在罅隙）的行动者，并未表现出筑居实践——即，他们在被束缚于评价权过度集中的结构中且清醒意识到其武断性时，并未在任何罅隙中建造自持运转的微型意义生境，而是大规模地滑向了单纯的崩溃或犬儒——那么，筑居概念的经验基础就被证伪了。筑居不是必然发生的——它只是三条条件碰齐时被逼生的一种有条件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在经验中被证明几乎不发生或极少发生，那么概念的实指效力便不成立。

第二，概念驳倒。 如果在进一步的概念辨析中，筑居被证明完全可以还原为调适性偏好、认知失调的一种变体、或布迪厄误识的一个亚型——即，筑居的“清醒”被确证为只是另一种更精微的误识，筑居的“另建生境”被确证为只是偏好调适的自我修饰——那么筑居就不再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新概念。本文第三章（3.4节）与第五章（5.5节）已经尽力在经验判据与理论机制的双重意义上与这些替代解释划界，但本文承认这道划界是可错的，也欢迎在未来的对话中被更精确的概念击倒或吸收。

第三，政治驳倒。 如果大规模的历史证据表明：筑居实践的盛行，与评价权过度集中结构的进一步巩固，在时间上呈显著正相关——

即，筑居者越多，体制越稳，罅隙越被回填，且没有任何筑居转化成集体行动的实例——那么，筑居在政治意义上的“庇护”功能将压倒其“生存技艺”的意义，它将被历史判定为一种客观上协助权力收编行动者的社会机制。这个风险是真实的，本文在5.5节中已经坦承并试图通过“意义界定权归谁”和“罅隙之间是否可水平连接”这两个条件来加以克制。这两个条件的失效，即构成筑居沦为安全阀的警报。

第四，自我驳倒——概念的阶层边界与可能的滥用。一股恶寒不应被忽视：本文所写的，会不会在某种情境下，被转化成一种更精致的、劝穷人“知足常乐、在缝隙里过好小日子就行”的规训话术？《老子》的“知足者富”是士大夫的自我修养，一旦从社会顶层口中说出来，就成了“你应该安于现状”的规训舌吻。筑居概念的使用者如忽略这一点——如将筑居描述为一种值得被政策推广的“生存技巧”，而非一种在逼迫下不得不实践的沉默技艺——则这个概念将从对生活方式的命名蜕化为对被压迫者的道德勒索。

必须申明本文概念的三个阶层边界：第一，筑居对行动者的认知能力与情感资源有较高的要求——它需要清醒识别一套社会评价底层逻辑的能力，这不是在每个社会阶层中均匀分布的禀赋。第二，筑居需要罅隙——物质上、时间上、制度盲区上的罅隙——而罅隙的分布本身是社会不平等的：极端贫困人口的全部生存时间被生存本身消耗殆尽，没有给罅隙留下任何一点时间余地。第三，筑居是一种沉默的个人性实践——它可能由于太沉默、太“不起眼”，而在公共话语中被无视或轻视。

以上声明不是在削弱概念的效度。恰恰相反——诚实地指认一个概念的阶层边界与被滥用的可能，是防止概念被意识形态化收编的唯一方式。如果未来的使用者能够尊重这些边界——知道哪些人群不属于这个概念的事实现象范围，知道哪些话术假借了筑居名义而行规训之实，知道在什么条件下筑居从生存技艺蜕变成制度的帮凶——那么这篇论文所做的，便不只是命名了一个新东西。它还这个名字划定了使用此名的伦理边界。

七、结语：那些在铁屋子的接缝处开窗种树的人

一百年前，鲁迅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后来有人批评这个比喻：铁屋子是什么？谁造的？怎么打开？鲁迅没有回答。他给的不是一份社会诊断报告，而是一种对于极度无望的结构性处境的艺术命名。

筑居者不接受铁屋子的全部给定。

他不睡——“清醒”是他第一件、也最重要的装备。他不砸墙——砸墙无用，墙厚过几代人的脊背，一个人撞上去只会头破血流收场。但他也不坐在屋角等闷死——他沿着墙缝一寸一寸地摸。不是找出口。是找接缝。铁屋子由许多块铁板铆成——板与板之间，总有接缝。接缝处漏进来的光，不足以照亮整间屋子，但足够照亮他一个人。光够亮时，他在接缝处种了一株草。草不需要太多土壤——缝隙里的积尘就够了。草不需要太多光——缝隙透进来的就够了。草长势缓慢，但它是活的。这株草养不活屋里的所有人。但这株草提供了两样东西。第一，它用自身的存在证明：这间屋子里，有一个角落，是不完全属于铁屋子的。铁板没有盖住一切。有人曾经在这里种活了草。第二，它给另一个人指明了接缝的所在。

不必等到铁屋子被打破的那一天，才允许人先在自己的罅隙里活得好一点。一座微型生境不是革命，但它是一个人——在无法推翻的结构中，在自己够得到的缝隙里——可以建设的最大的自由。

参考文献

布迪厄, P.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德塞都,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福柯,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斯科特, J.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森, A. (1987).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森,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努斯鲍姆, M. (2000).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